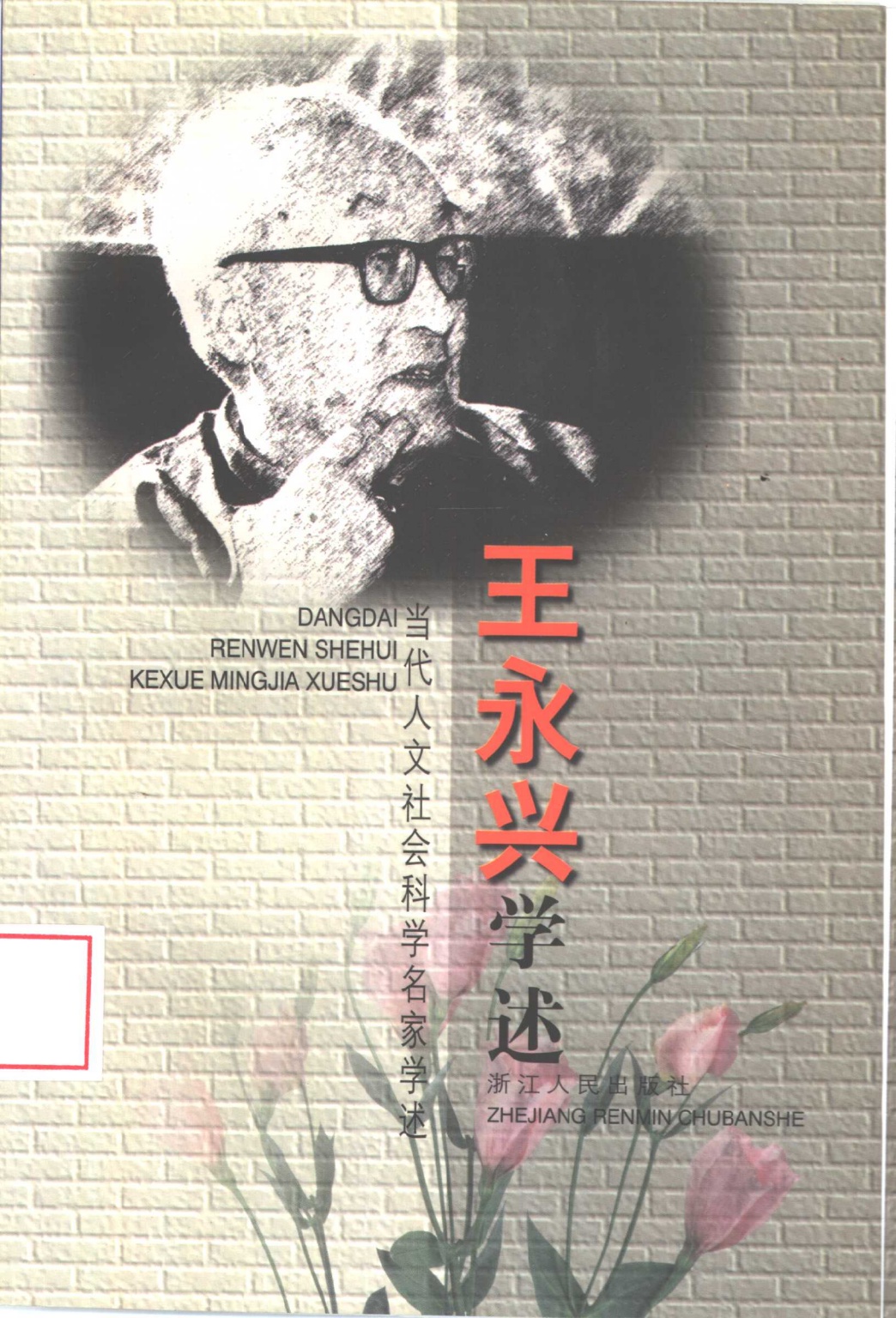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当代
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王永兴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王永兴著

王永兴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丛书策划: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周向潮 何梦祥(特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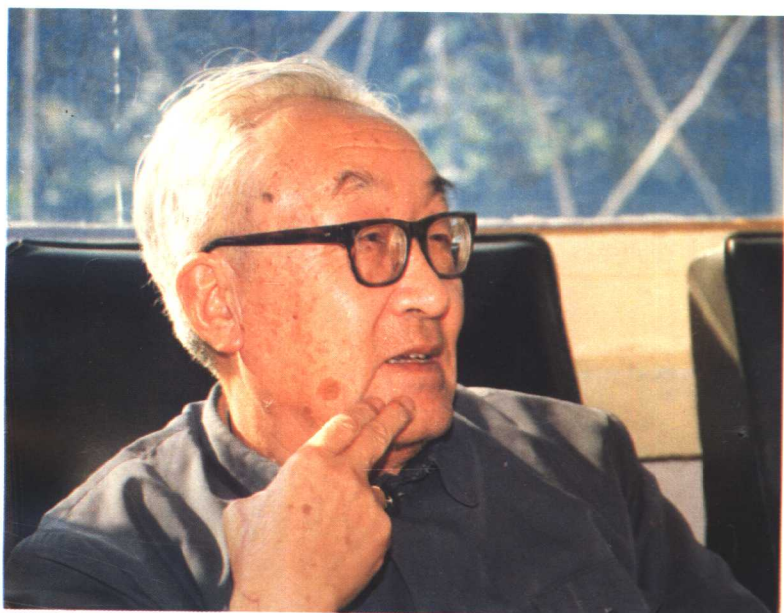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韦 伟

王永兴学述

王永兴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 开 本 850 × 1168 1/32
- 印 张 8
- 字 数 18 万
- 插 页 2
- 印 数 1 - 3000
-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1730-6/G · 449
- 定 价 1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王永兴先生在书房



王永兴先生部分著作

目 录

MULU

王永兴
学述

自 序	1
我的治学经历	3
我对义宁之学的理解补述	26
寅恪先生对民族的独立学	
术文化的论述	26
寅恪先生对华夏民族学术文化	
复兴之论述	29
寅恪先生史学的渊源	34
寅恪先生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39
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	44
寅恪先生重视史及史学	46
谨述师道两端	60
唐代前期行政管理制度(以	
用水制度为例证)初论	66
尚书都省的《公式令》	67
尚书省工部之水部的《水部式》	74
唐敦煌地区灌溉用水细则	86
唐开天九节度与四个军事格	
局中的蕃兵述论	94

唐太宗对保卫大唐帝国、开疆拓土以 及使用蕃兵的策略	94
开天九节度及四个军事格局	110
两个问题	170
我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教学与 研究述略	174
第一阶段	175
第二阶段	183
我国中古时期的户籍及其反映的社 会特点	225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旨述要 补述	240
附 录	247
著作目录	249

自序

林在勇先生以“王永兴学述”为题，命我撰稿，盛情可感。据我理解，学识精深、能成一家之言的学者。自述其学，可称之为“学述”。我学识浅薄，不敢当此荣誉。然自念从恩师陈寅恪先生受业多年，对先生之学有所理解，而先生之学乃吾华夏民族学术文化振兴之根柢也，其意义重大如此，我对先生之学所知虽少，亦应述之，以供有志于研究华夏民族学术文化之学人参考，故不自量力而有是书之作。

本书分六篇。第一篇为《我的治学经历》，是对我自己治学生涯的回顾。第二篇为《我对义宁之学的理解补述》，在拙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一书中，对寅恪先生之学有所遗漏且又甚重要者，故不能不加以补述。第三篇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制度（以用水制度为例证）初论》，行政管理，均制度也，此乃受寅恪先生重视制度之启发而作成者；第四篇为《唐开天九节度与四个军事格局中的蕃兵述论》，乃受寅恪先生重视唐代使用蕃兵建功立业之启发而作成者，撰此两篇，亦用以检验我理解并使用寅恪先生治史方法的程度如何。第五篇为《我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教学与研究述略》，忆40年代初读先生所著《陈垣敦煌劫余录

序》，知我国敦煌学之研究落后于东西洋各国，并有勉作敦煌学预流之激励，在耻辱与激奋中，我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与教学，此篇乃这一过程的简要记录。第六篇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旨述要补述》，乃为申述先生撰著此书之深意。以上诸篇，陈述于读者前，请求教正。

王永兴 一九九八年七月于

北京荷斋

我的治学经历

我乃农家子，少年体弱，在乡塾读《三字经》，颇得塾师称赞。家大伯父认为我体弱不能务农，但可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当时我在沈阳东北大学附中读高中一年级，我不愿作亡国奴，流亡到北平，过着乞丐和半乞丐生活。1933年，家大伯父从家乡来北平看我，从乡亲处借得十元钱给我，要我补习功课，考大学。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创作白话诗。现在我叙述我的治学历程，而旁及家大伯父事，盖不忘本也。孝于家而忠于国，是儒家基本思想之一，我是儒家门徒，不能不守孝道。如无家大伯父的坚持决定与关怀，我是不可能走上读书治学这条路的。

旧时清华大学颇重视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大一国文课是各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讲课教师都是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我所在的一班国文课的教师是朱自清先生，教授古文，也教授白话文。两周作文一次，佩弦先生亲自批改。这一年的国文课对于我这个只读过十八天高级中学课的学生来说真获益匪浅，加固了我此后读书治学的文

字基础。

1935~1936年,我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秋,我不幸患了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休学一年,住进香山疗养院。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我国的战争,侵略军侵占北平。疗养院停办,清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临时大学。我冒着很大危险辗转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我选修了恩师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徐高阮学长兄也选修了这门课。这是我第一次听寅恪先生讲课,也是我一生从先生受业的开始。记得上课铃声响过,先生抱着黑布包着一大包书走进教室。他先写了一黑板史料,然后坐在藤椅上(这可能是学校照顾先生特备的),闭目讲课,根据写在黑板上的史料讲授。一黑板的史料用完了,先生又第二次写黑板。一次两个课时的讲课,先生要两三次写黑板,没有史料,先生是不讲课的。在这一次讲课中,最使我们赞颂的是先生的治史方法,即时间性、空间性(地域)与人事三者相互关系之法。先生教诲我们,一件史实,一次历史事件,要从它们发生或出现的时间、所在的地域是否符合,是否合理来分析,同时还要看其间出现的人事关系是否可能,要从这三方面来确定一件史实,一次历史事件的性质及其意义,这样才能求得历史真实。课后,高阮兄和我均极振奋,能遇到这样的教师是最大的幸运,我们要一生从寅恪先生受教,因而要转系。高阮兄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我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我们即刻去见教务长潘光旦先生,陈述我们的申请。听完我们的话,光旦先生笑了,他说:“你

们选择了最高学术水平的教师，一生从他读书学习，一定有成就，我同意你们的申请。”我们极为欣喜，向光旦先生道谢。但光旦先生指着高阮兄说：“你已耽误二年（高阮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二年），现在转系，你的大学要读七年。”接着，又指着我说：“你患病已耽误一年，现在转系，你的大学要读六年。你们二人，不会后悔吗，是否再加考虑？”我与高阮向光旦先生坚决地保证，绝对不后悔。光旦先生笑了，说：“很好！很好！”从这一天起，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是寅恪先生的学生，寅恪先生是我们做人与读书治学的导师。这一天的决定，对我一生治学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对我一生作人也是如此；我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乃治学与做人密切关联也。对高阮兄也是如此。6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深情地回忆着这一幕时，我仍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庆幸不已。只是寅恪先生、光旦先生、高阮兄均已远行不归，我深藏心底的感激亦无处可诉了，思之怆然。

此后，我的精力及时间大半用在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学习上。先生指定必须阅读的书很多，《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通典》、《唐会要》、《五代会要》，特别是《资治通鉴》，必须精读熟读；先生嘱咐，《通鉴考异》与胡三省注，必须与《通鉴》正文同时读，《考异》与胡注均极重要也。先生又嘱咐，必须认真读书，只听讲课，不读书，或不认真读书，是不能学好这门课的。

1938年春，学校从长沙迁往云南昆明，并改名西南联

合大学。清华、北大、南开南迁时，图书亦同时运来，但绝大部分只能藏在大木箱里，因无房屋也。云南省立图书馆（亦称翠湖图书馆，因在翠湖公园内）虽藏书不多，但我们要用的书大多数都有，先生指定的必读书都能借到。因此，除了上课外，我们每日都在翠湖图书馆读书。1939年7月，我在大学本科毕业，毕业论文是在寅恪先生指导下写成的，题目是“唐代后期黄头军考”。先生讲授唐后期元和平淮蔡之叛，以出自铁勒族的李光颜率领的黄头军（即忠武军）之功为多，黄头军乃胡兵也。我的论文搜集史料较多，寅恪先生审查通过；但对于我提出“黄头军”之名出自黄头室韦，先生认为不确，应再详考。

大学毕业之后，我谒见先生，陈述我愿意继续从先生学习唐史，拟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特来请示；先生笑许之，并为我写一简短推荐书，命我面呈郑毅生先生。毅生先生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所务。

当时，研究生的考试为答辩，即口试。暑假期间，先生去香港看望师母，由郑毅生先生主持答辩会。答辩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教师宿舍楼下食堂举行，在七位答辩委员座前，我坐在小凳上，感到很紧张，一个月来围绕着我的论文所作的准备一大半忘了。其实，答辩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大多与我的论文无关，有些问题与唐史也无关。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满脸汗水，是否回答对了，毫无把握。毅生先生宣布休会，要我到对面小屋子去休息，并安慰我不要紧张。大约一小时后，毅生先生让我回到答辩会场，当众宣布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我的答辩，我被录取为北京大学文

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我很激动,也很高兴,我可以继续从寅恪先生学习唐史了。

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教师宿舍是一座旧式三层小楼,已经很破旧。一层的一间大屋子是研究生宿舍,可以居住十人。录取后几天,我搬进这间大屋子,一个小木床,一张小书桌,一个书架,这在当时是被人羡慕的读书研究的最佳条件。更佳的条件是借书方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我们可以从史语所借书,拿回宿舍,我的小书架就摆着《资治通鉴》、两《唐书》,白天黑夜都可以在宿舍读书。一年后,北京大学在昆明东北郊龙头村宝台山上建筑十几间草房,三届研究生约 20 人迁居宝台山。史语所就在山下,借书更方便了,两人一间房子,读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我的同屋是任继愈学长兄,二人终日苦读。

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轮替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都是一学年的课程。每次讲课都是新的内容。每周我从龙头村走 15 里路到昆明文林街北院西南联大教室去听寅恪先生讲课。这是我接受寅恪先生指导的一种方式,也是我学习寅恪先生之学的一种方式。从先生讲课中,可以窥见先生如何读书,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分析并解决问题;从先生讲课中,也可窥见先生如何搜集史料,分析考证比较,采用最真实而详备的史料多种,以证成先生的创新学说。听课后又走 15 里路回到龙头村宝台山。一边走路一边深思。听先生讲课,我获得宝贵的教益,我感到愉快和振奋。每一次听课,都是如此。

寅恪先生指导我读书的另一方式为审批我的读书报告。每一学期,我写两次读书报告,送呈先生审查教导。我从龙头村走到靛花巷,先生住在二楼,我谒见请安后,呈上我的读书报告。先生慈祥地说:“我看完后,通知你,你再来。”一周后,我谒见先生,先生说:我读书很认真,这一长处应继续保持。但为什么提不出问题呢?自己应该认真想想,病在何处。我恭敬回答:我听先生的话,认真想想自己在读书中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然后行礼退出。有时,先生把我的读书报告托人交给我,先生有简略批语。如在一次读书报告上,我写的考证一语,写“證”为“证”,先生在“证”字右侧加圈,并批之,要正写为證。当时我很惭愧,现在仍很惭愧。忆先生青年时留学德国,学梵文、巴利文等,仍不忘读经,每一字必求正解(见蒋天枢先生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俞大维文),我写几千字的读书报告,竟不能正写华夏民族的文字,应痛改前非也。当然,文字改革后,“证”为“證”的简体,但不可据此掩饰我在40年代初之过失也。

在讲授唐史时,先生论及魏博牙军,乃胡化之军也,并谓唐后期类似魏博牙军者甚多,应多方面搜集史料。遵先生之教诲,我拟以此为题,撰写诠释史料之文,即以此意稟告先生,先生许之,并教诲说,正史如两《唐书》等,唐人诗文以及笔记小说如《太平广记》等,都要查阅,搜集史料,不厌其详,不厌其多,惟诠释及立论,则当有所选择也。文成,呈先生审阅之,先生谓史料仍不足,又以慰藉之语气告我,史语所已迁往四川,省图书馆藏书恐亦不多,无书可查,俟他日完成之。

近年来,读司马温公《答范梦得》(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三),温公论长编考异治史之法,论及撰丛目时,有“即注之,过多不害”之语。夫撰丛目,即分门别类搜集史料也。忽忆及 50 多年前,寅恪先生教我“搜集史料,不厌其详,不厌其多”之语,与温公“即注之,过多不害”之语,其意相同,则先生治史之法乃继承宋贤长编考异之法也。后又读《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序中,寅恪先生盛贻遇夫先生以“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治经,即以治史之法治经,益信先生治史之法即长编考异之法而又有发展也。

1942 年,我写成《论唐代朔方军》一文,此文乃据寅恪先生之启发而写成者。先生讲授唐史时,曾指出:安史叛乱中,朔方军乃唐室中兴之关键。我撰此文,乃先生学说之注释。朔方军之所以强大,因其主力乃胡族之部落兵也。此文撰成于 1942 年夏后,未能得寅恪先生审查,先生已离开西南联大,在广西大学任教。郑毅生、向觉明二位先生继任我的导师。一日,毅生师告我,学校正式决定我留校任教,协助毅生师讲授唐史,是否参加答辩,由我自己决定,不答辩,为卒业,不影响我留校任教也。于是我未参加答辩,留校讲授唐史课。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嗣后北大、清华迁返北平,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46 年秋,先生由英转美返国,回到清华园旧居。遵先生之命,我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职,任先生助手。时先生赴英治目疾无效,已双目失明。我从先生受教十年,先生对

我恩泽深厚，自应侍读先生左右，为先生效劳也。此后至1948年末，有时一天、有时上午在先生家，我的工作：先生备课时为先生读书，先生教课时，我在黑板上书写要用的史料，到图书馆借书还书、查阅抄录先生使用的史料及有关学生作业的批改等琐事，工作一天或半天，我极愉快。

先生备课讲课极认真。以教授唐史而言，在备课时，先生指定《通鉴》、《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十多种书，要我读给他听。首先读《通鉴》，我按照先生指定的卷数，一字一句地读，先生静坐闭目听着。一次，我还未读完一段，先生命我停下，又命我重读这一段，要读更慢一些。我意识到我读书中有错误，于是一字一句慢读，才发现前一遍读脱漏一字。一段读完，先生有笑容，虽未说话，可见满意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从读书治学的角度来衡量脱漏一字，这表明我读书不够认真，不够严谨，作为寅恪先生的学生，我感到惭愧。

读完先生指定的十几种书的有关部分，拟定教课纲要，先生口授，我写。拟定一部分之后，先生命我慢读一遍，先生沉思片刻，命我再读《通鉴》某一段，再读其他二、三种书与《通鉴》记事相同部分，先生又沉思片刻，然后分析其异同，决定采用《通鉴》或其他书的记述，修改已拟定的提要。这样的修改经常重复两三次，这一小部分讲课纲要才确定下来。一个月讲课四次，提要的拟定常常要用七、八天时间。先生这样备课，使我受到深刻教育。治学要下苦功夫，掌握大量史料，要比较分析，孰可用孰不可用，根据如

何，一一明辨之后，方可采用深切著明之史料为立论之根据。或如上文引司马温公《答范梦得》所云：

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如《左传》叙事之体也。

先生讲课，亦极认真。教室为先生住房中一大间，可坐二三十学生。上课前，我写两黑板史料，学生来到后，我扶持先生从书房走入教室，先生坐在藤椅上，我禀告写在黑板上的史料的顺序，先生即据史料顺序讲课。在讲课中，史料原有的一字之差异以及史料的来源都作详细说明，为求得历史真实也。先生讲课中，从不忽视小问题的分析考证，但其重点则为关于国家人民者。从备课到讲课，先生始终认真细致。先生体弱，我侍坐先生之侧，看到先生已甚疲劳，但他毫不松懈，直至我禀告说，下课的时间已到，他才停止讲授。这是讲唐史课，是学术的研究与讲演，也是育人之课。不顾自己体弱疲劳，始终如一地认真讲授，这是高尚品德，是作人所必须具备的，先生的高尚人格，教育了全班学生，教育了我。做人要以先生为楷模，陈述我的治学经历，不能不说到我的做人经历，二者是不可分的。

1948年末，先生离校进城并即南行的前夕，在书房中，我侍坐先生之侧。夜深，先生以做人治学之道谆谆教诲，余谛听之，愿终身行之。可能由于感到先生此次南行，不知何日再面聆教诲，我说话时声音凄怆，先生安慰之。不意这竟是最后一次先生对我的当面教诲，痛哉！

1949年，雷海宗先生主编《社会科学》杂志，它是又一